

抗大八分校的办学历史

□ 方 伟

位于皖苏交界处的安徽省天长市龙岗社区，是一座水乡古镇，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以下简称八分校）所在地，留下了丰富的办学遗存，是全国14所抗大分校旧址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所。4年多的敌后办学时间，八分校先后培养了2000多名军政干部人才，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贡献。

八分校前身是成立于1940年5月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师，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一部扩建为新四军第二师军政干校。不久，经时任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提议，中央军委同意，新四军第二师军政干校改为抗大第八分校，由第二师直接领导，同时与抗大总校建立联系。新四军副军长、二师师长张云逸和副师长罗炳辉分别兼任八分校校长、副校长。5月4日，八分校在天长县张公铺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张云逸作了动员报告，阐明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着重阐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第一期开学时有学员近400人。不久，因日军发动大“扫荡”，学校几经辗转于同年秋迁到天长龙岗。由于新招收不少青年学生，学员总数达到600多人。八分校在龙岗利用相对安定的环境进行正规化办学，教学质量有了显著提升。1942年4月，第二期开学，学员800多人，均为第二师营以下干部。开学前罗炳辉兼任校长。同年8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召开的华中抗大工作会议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对八分校取得的教育成绩给予了表扬。1943年4月，八分校撤离龙岗并移驻附近农村。当年秋季，八分校改编为第二师教导团。其后八分校（教导团）继续办学两期，培训学员800余人。

八分校办学体制是校、队两级制。校的领导机关设有训练处、政治处（后改为部）、供给处。校机关还下设有俱乐部、医务所、实验剧团、校报社等机构。学员队主要分为营级



以上干部队、连级干部的军事队和政治队、排级干部的军事队和青年学生队等。各学员队设有队长、指导员。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也有少数是来自根据地和从上海等地投奔新四军的知识青年。第二师师部高度重视教职工队伍建设，学校的不少处长、科长等都是红军老干部。教员以部队选拔为主，也有部分来自抗大总校和地方。1943年春，抗大华中总分校撤销时派出数十名教员和干部来到八分校，有力加强了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力量。

教学内容以政治理论和军事为主，兼顾文化知识的学习。政治理论教育主要包括时事政策教育和理论课程。时事政策教育主要由新四军军部和第二师师部领导作辅导报告，一般以上大课的形式进行。陈毅、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等都到校作过报告。常设的理论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建设和党的政策等。文化教育方面，主要包括语文、算术、历史和地理常识等内容。军事教育主要学习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思想和各种作战方式等内容，同时进行投弹、射击、翻越障碍等基本军事训练。张云逸、罗炳辉都曾为学员亲自做战术示范动作。根据形势需要，八分校还组织学员参加战斗和军事演习。1941年5月底，八分校成立不久，日军对

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发动了大“扫荡”。学校组建了战斗小分队，参加并顺利完成侦察和阻击敌伪军的任务。1941年秋，八分校组织全体学员进行了长途行军和军事演习，历时半个月，行程700余里。

八分校极为重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学校坚持每周开展党日活动，召开党小组会，检查思想，学习党的文件。1941年9月，张云逸、郑位三、罗炳辉等向学校评选出的模范党员颁发了证书和奖品。1942年到1943年，在全校进行了革命人生观、反不良倾向的教育。1943年到1945年，学校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各项教育工作的开展，提高了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日军政大学校训在八分校得到了严格贯彻和践行。一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之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新四军和根据地建设实际，力求以理论指导实践，做到知行合一。第二师政委郑位三组织指导部分教员和学员深入农村开展近一个月的调研，使参加人员受到了深刻的群众教育和实践锻炼。二是弘扬艰苦朴素之风。敌后的办学条件十分有限，学员们克服没有课堂、没有桌椅、没有纸笔的诸多困难，坚持学习。八分校组织学员开荒种菜、

养殖鹅鸭，既改善了伙食，又磨砺了意志。三是弘扬团结友爱之风。干部和教员既关心学员学习和生活，又处处发挥模范表率作用。学员们怀着相同的理想信念和革命追求聚集在一起，彼此互相关心帮助，结下了深厚真挚的情谊。

八分校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注重军容军纪，每天进行早出操、晚点名，经常于夜间和拂晓进行紧急集合，强调令行禁止、分秒必争。紧张的学习之余，学校的文体活动丰富多彩。晚饭后或节假日常有篮球等比赛。出操、上课和开饭前，各队都要唱歌、拉歌。每周一次同乐晚会，学员自编自演，热闹非凡。有学员多年后仍然感慨：我们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困难很多，但同学们很舒畅、很惬意、很自豪、很活泼开朗，到处歌声飞扬。

八分校与驻地关系极为融洽。学校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驻地群众的拥护。学员们经常帮助群众进行生产劳动，帮助地方防汛或者修路。在医药较为紧缺的情况下，学校医务人员常为群众看病送药。驻地干部群众对于八分校的办学也非常支持，很多群众将住在自己家中的学员视作亲人。家境富有的龙岗青年戴之炎受到八分校校风熏陶感染，主动捐出自家农田100多亩作为八分校操场，并带头参加抗日武装。1943年8月，八分校组织师生与地方干部联欢，地方赠学校一面写有“越抗越大”四个大字的锦旗，八分校回赠一面写有“铜墙铁壁”的锦旗。1945年8月，随着在校学员全部分配到前线部队，投入对日军的最后一战，八分校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八分校的学员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不少学员更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在激烈的枪林弹雨中，实现了自己在抗大学习时为国捐躯的钢铁誓言”。

红色记忆



□ 王明新

很多年没进过影院了。除了在央视的电影频道与某部电影偶遇外，电影已经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2025年春节，哪吒“大闹”世界影城，并创造出亚洲电影票房之最，勾起了我对电影的一些记忆。

小时候，我对电影曾经那样着迷，看见大街上新张贴的电影海报，心里便百爪挠心。电影票虽然只要五分钱一张，却没钱看，常常约上几个小伙伴，吃过晚饭乘着夜色去翻电影院的墙，看“免费”电影。电影院的围墙很高，我们搭成人梯，先将一个人弄到墙顶上，先上去的人再把下面的人一个个拉上去。《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电影都是通过这种方式逃票看的。看“免费”电影的人多了，自然会引起电影院管理者的注意，有一次我们全被“生擒活捉”，关进电影院的一间小屋里，直到夜深人静才放出来，回家又受到父母的严厉批评，从此再也不敢去逃票看了。

到了青年时期，我依然是个电影迷。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胜利油田钻井队的钻井。钻井队驻扎在一个荒无人烟的草甸子上，生活的全部内容除了睡觉就是干活，没什么娱乐活动。半年后钻井队搬到县城附近打井，去县城看电影就成了最大的乐趣。从钻井队驻地到县城大约五公里。电影晚上放映，而钻井队三班倒，要看电影上白班的时候不能去，

因为干了一天活实在太累；上四点半的时候也不能去，因为要上班；只有上零点班的时候，才有时间去。上午去买票，到了下午晚饭也顾不上吃，从食堂买几个馒头，一边啃一边往县城赶。看完电影天已经很晚了，隆冬的野外很黑很冷，无遮无拦的北风呼啸着，冻得瑟瑟发抖的我，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回走，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驻地立刻钻进暖和的被窝里睡上一觉，而事实上是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更别提睡觉了，因为回去后就到接班点了。这时候又困又乏的我，心里就会生出些许悔意，后悔去看电影，但等到下次上零点班的时候，又忍不住会去看。

因为喜欢写作，在钻井队工作不久就在油田创办的报纸上发表了几篇作品。钻井指挥部电影队想找个人写幻灯片脚本，于是我有幸调出钻井队，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电视还极为陌生，因此对电影普遍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每次出去放电影，拉我们的汽车还没到，放映点上的人早已经得到消息，人们奔走相告，传递着晚上有电影的“喜讯”。尤其是几个家属点，如分厂和附近的几个村，这些地方住的都是钻井工人的家属，男人在钻井队上班，几个月也回不来一次。钻井工人的妻子在地里种水稻，老人和孩子不出工。家属们早早就蜂拥到放映点，放映场地都是露天的，他们以不

同的方式占地方。太阳还老高，场地上就摆满了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椅子、长条凳、小板凳、小马扎，还有用不同颜色画出来的各种不规则的圆、线条、曲线，用砖块和石子摆放出表明“此处已经有人”的种种图案。拉我们的汽车一进村，小孩们便呼啦一下子涌过来，先是迎着我们的汽车跑，然后是跟在汽车后边在卷起的尘土中奔跑，一边跑一边高喊：“放电影啦！放电影啦……”汽车一停，他们立即围上来询问放什么片子，是不是“打仗”的，得到答案后，便一阵风似的跑出去做义务宣传员了。

又过了不久，实行改革开放，电影的数量增多了，还有很多进口影片上映。有些特别受欢迎的影片要连续放十几场，我也因此享受了一场又一场电影盛宴。比如反映二战时期南斯拉夫游击队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战斗故事片《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看得多了，电影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我几乎可以背下来。

油田俗称“没有围墙的工厂”，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到了春节，他们也会像鸟儿一样飞回自己的老家。当然，也有不少人要留下来坚持生产。进电影队的第一个春节，只剩下我与放映员小马值班，我们的任务是每天放两场电影，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放映地点是作战室。作战室里面墙上挂的是地质构造和剖面图，是地质学家

们研究石油生成条件和布置井位的地方，比较宽敞。

那年春节，雪下得特别大，一觉醒来，我听见外面有人问“过年好”的声音和人行走在雪地上发出的咯吱声，知道有人向作战室走去准备看电影了。而且大都是妇女和孩子，因为男人不是在值班就是要去生产现场。我和小马立即起床，检查了一下片子，就提着片盒，踏着没过脖子的积雪向作战室走去。那个春节期间，依稀记得我们放映了《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霓虹灯下的哨兵》《五朵金花》《江山多娇》《青松岭》《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地雷战》《地道战》《黑山阻击战》《渡江侦察记》等多部影片，只是那个春节的年初一，我第一次没吃上饺子，别说饺子，饭也没吃上。但作为一个“资深”影迷，我给大家放电影，一起看电影，别提多开心了。

现在回想起来，电影给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欢乐，陪伴着一代人的成长，留下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记忆。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春秋时期卫国人，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孔门十哲之一。在孔子众多弟子中，子贡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仅次于子路。通过分析子贡的独白、子贡与他人的对话、孔子对子贡的评价、子贡对于自我的认知，可以清晰地把握子贡巧言善辩、悟性极高、知师敬师的基本特征。

巧言善辩。子贡在孔门弟子中以“言语”著称，巧言善辩是子贡最鲜明的特征。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记载：“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就是说子贡能言善辩，并且经常与孔子探讨问题。分析《论语》中有关子贡的语录，可以发现他善于运用比喻来进行说理：将君子的过失比作日食月食，“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把才能德行比作围墙，用万仞宫墙来形容孔子学问的高深，“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窺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将一般人的贤能比作山丘，将孔子的贤能比作太阳和月亮，“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将孔子的高不可及比作像天不能够顺着梯子爬上去一样，“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将文采比作虎豹的皮，“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鞶犹犬羊之鞶”。这些比喻生动贴切、瑰丽奇特，显示出子贡的想象力与语言表达能力，也反映出子贡十分具有文学才华。

子贡善于发问，有时言在此而意在彼，问得迂回委婉，别人回答以后，他也能很快领会对方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美玉在这里具有象征意味，表面上子贡是在问应该怎样对待美玉，其实却是在追问孔子对于入仕和出仕的态度。在《论语·述而》中，再有询问子贡孔子是否赞成卫国君辄与其父制颛争夺君位，子贡进到孔子屋子里，没有直奔主题，而是旁敲侧击，用伯夷、叔齐发问。伯夷和叔齐是互相让位而逃出国家的，子贡根据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推断出孔子对于卫国国君的态度，最后得出“夫子不为也”的结论。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显示出子贡与孔子的谈话技巧，二人对彼此的真正意图心领神会，闻弦歌而知雅意，对方肯定不会会错了意。子贡能说会道，难免对于别人的短处评头论足，最终引来孔子的批评，“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会说话，但有时没有使用得当。

悟性极高。孔子对子贡既有批评也有赞美，曾经用瑚璉来形容子贡，认为子贡是治国贤才，可以担任国家重臣，表现出孔子对于子贡的认可与期望。孔子还用“告诸往而知来者”来肯定子贡，也就是说子贡能够做到举一反三，悟性极高。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认为，如果教给一个学生东方，他却不能由此推知西、南、北三方，就不必再教他了。举一反三，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人的领悟能力。在《论语·学而》中，子贡巧妙地借助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引导孔子提出更高的道德境界“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不仅迅速领悟了孔子的深意，并且能够敏锐联想到《诗经》中的句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从中可以看出他能够将孔子的道德教诲与自己所学的《诗经》知识相结合，展现出触类旁通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子贡对于知识的深刻理解与灵活运用。当孔子询问“女与回也孰愈”时，即你和颜回两个相比，谁更好些？子贡很聪明也很谦虚，知道老师最喜欢颜回，于是只用“闻一以知二”来评价自己，而赞许颜回能够“闻一以知十”。需要指出的是，孔子虽然用“瑚璉”和“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字眼来赞美子贡，但是一旦把子贡与颜回作比较时，孔子的态度马上就发生了变化。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

《论语》中子贡的形象

□ 马会祥



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颜回了解我的学说差不多了，可是生活却常常贫穷。端木赐还不是很了解我的学说，但他从事商业活动，猜测行情，竟然都猜对了。从叙述二人遭际时的口气中可以感受到孔子更倾向于认可颜回。

知师敬师。孔子对子贡有褒有贬，子贡却始终保持对老师的尊重与爱戴，从来没有对孔子有过微词，这一点跟子路形成鲜明对比。子贡对孔子的赞美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周游列国期间，孔子一行踏足了卫、曹、宋、齐、郑、陈、蔡和楚等多个国家。每到一地方，孔子都能迅速融入当地的政治环境，并发表独到见解。子禽觉得很奇怪，就此向子贡发问：“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随即用“温、良、恭、俭、让”五个字概括了孔子的气质与秉性，称孔子是靠温和、良善、恭敬、节制、谦让这样的美德而了解各国政治状况的。子禽不去问他人，而去问子贡，这也侧面反映了子贡对孔子的了解。子贡很有外交才能，又是儒商的鼻祖，所以有一些人，像叔孙武叔和陈子禽，认为子贡比孔子还要强些。面对“子贡贤于仲尼”“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这样的评论，子贡坚决反驳，“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窺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子贡对孔子深深的敬重，也说明子贡在这些称赞面前能够保持清醒，非常有自知之明。孔子逝世后，弟子们遵循礼仪为他服丧三年。三年期满后，子贡在孔子墓旁搭建小屋，又守了三年。为表达对老师的怀念，子贡亲手种了一棵楷树。这棵树如今依然在孔林享殿后，只不过被雷火烧毁，成为一段枯桩。树前立有一碑，上书“子贡手植楷”五个大字。这棵楷树见证着孔子与子贡师生间真挚的情谊，更成为传统“师道”文化的精神典范。